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牛津通识读本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Politics

[英国] 肯尼思·米诺格 / 著

龚人 / 译



译林出版社

[英国] 肯尼思·米诺格 著 龚人 译

牛津通识读本·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Poli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 (英) 米诺格 (Minogue, K.) 著;
龚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 Poli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2982-6

I. ①政… II. ①米… ②龚… III. ①政治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3541 号

Copyright © Kenneth Minogue 1995

Politic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5.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046 号

书 名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作 者	[英国] 肯尼思·米诺格
译 者	龚 人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毫米×889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4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982-6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序言

张凤阳

对初涉政治学的中国读者来说，肯尼斯·米诺格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欧洲知识界，这位业已退休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却一度是出境率很高的公众人物。他做过《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还录制过名为“新启蒙”的电视节目。一位有着如此经历的学者，晚年撰写一本政治学的入门小册子，想来是很自然的。但是，考虑到米诺格主要凭先期出版的《自由性灵》、《民族主义》、《异化的权力》等学术力作而赢得了自己的声望，我们就应该恭敬地看待手头这本似显平常的通识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是米诺格长期理论思考的凝练表达，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借着一本小书，他为什么能深入浅出地讲一些大道理，而且讲得那么通畅，那么令人三思。

在日常言谈中，人们往往把政治比作游戏。但在历史上，参与这种游戏却要冒很大的风险。涉身官场的每一个人，大略都能体验到如履薄冰的滋味，更不用说高层权力斗争的流血和死亡所营造的那种恐怖气氛了。现代政治的一个文明化表现，也许就在于使从政不再成为一种引来莫名杀身之祸的高危职业。今天，虽说政客之间和政党之间的角逐依旧暗含着阴谋伎俩，但是，宪政法治的制度框架，毕竟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游

戏规则。正是靠着这些规则的约束,政客和政党的表演不仅看来益发轻松,而且,其行动逻辑也有了更多的理性化色彩。缘此,那些掌握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等数理方法和先进计算机工具的当代学者,便试图像科学地研究自然一样科学地研究政治。他们挖资料,采数据,建构起一种又一种解释框架,不断提高着政治行为分析和政治过程研究的科学化水准,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参谋意见。但是,政治学研究只能沿着这样的路线朝前走吗?米诺格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这话几乎明示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批评。

本书使用了若干通俗类比,其中颇具深意的,是把国家喻作一艘航船。“政治就是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艺术。”一如航行需要灯塔,国家的治理也需要理想的指引。因此,政治学不能在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保持中立。米诺格告诉我们,在思考良政善治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历史方法也许比科学方法有用得多。于是,本书就试图通过历史的巡礼,给人们指示一条理解政治的路径:希腊民主如何诉诸公民参与;罗马共和怎样培育公民美德;基督教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环;国家的政治整合与个人的自主独立为什么成为政治现代性的双重面相;以及,为谋求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良性均衡,现代政治文明如何从传统中提取价值资源,又怎样超越古典主义,在更高水平上构建了崇尚自由的宪政民主体制,等等。也许可以说,高屋建瓴和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理论造诣深厚的公共知识分子,米诺格熟悉文明史上的价值之争,更清楚“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当代

共识性政治话语所包藏的深刻分歧。所以,他更愿意启发读者去思考,而尽量避免代读者下结论。“为政治导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义’”,也许是本书最旗帜鲜明的立场表达。但悉心揣摩,我们又会在这立场表达背后发现某种思想的审慎。其辩证意涵是:在形而上的价值层面,追求正义俨如来自神圣之域的绝对律令,天然正当且永远有效;而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若监察既定的政府组织或政策实践,看其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正义要求,则必须用怀疑的目光来打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趋向正义的每一点进步,都应给予首肯;但对那些打着道德旗号彻底改造世界的政治运动,却应保持高度警惕。良好的政治生活与专制主义不相容,可是,专制主义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上曾大行其道的专制君主,今天已不再受人追捧;但包裹着理想外衣的意识形态,却带来了现代僭政的新隐忧。因此,应力戒道德的泛政治化和政治的泛生活化。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平常的世界”,但在这个平常的世界,“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关乎政治,正如同踢足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与裁判争辩”。在这个意义上,米诺格说要防范政治的僭越,归根到底就是要防范公共权力的僭越。

在米诺格看来,我们或可制订出相对正义、自由和民主的政治规则,但仍无法解决在广阔背景中的人性叵测与文化差异。所以,向往理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要警惕种种或明或暗的“狭隘偏见”。也正因此,政治学处于“通识教育的核心”,它关切着我们在道德品性和经验生活中的双重幸福。

2008年4月2日于南京大学

前言

托马斯·曼^①说：“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命运的含义是通过政治语汇来昭示的。”在大学里的许多学究看来，这当然是对的——那些冬烘先生们相信，一个人不管是在读诗，还是在偷情，他必定同时也在表达一种政治观点。以常识判断，这一看法之荒谬并不下于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性表露”的那种庸俗化弗洛伊德观点。叶芝^②曾经这样回应托马斯·曼：

那姑娘在眼前亭亭玉立

什么古罗马、俄罗斯

还有西班牙政治

我哪有心思读下去？

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常识。在政治中一切都是真实的，政治中讨论的问题只有对或错的分别（或多或少如此）。人们真的流血，真的死亡。政治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平常的世界，我们可以于其中彼此交谈；而那些将人的经验化解为观念、眼界、知觉元素^③、价值观、主流、文化等等的哲学家们，他们将摧毁这个平常

①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由译者添加

② 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

③ 英文为sensa，是经验主义学派使用的哲学名称。这一学派认为，经感官获得的知觉元素构成了人的认识。

世界。政治是一种活动,它支撑着人类生活的框架;但政治并不等于生活。怀疑主义哲学家、道德相对论者、激愤的学院派社会批评家、宗教理想主义者、富于幻想的预言家,这些人在我们的文明谱系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但他们对政治的干预却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近两个世纪以来尤其如此。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尽管有能力安排许多种生活方式,却必须与上述冒险活动保持距离。然而政治活动的确可视为人类生活,充满了英雄主义和尔虞我诈。要想了解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千变万化的。

本导论力图在极短小的篇幅里置政治于学科与历史的双重语境中。本书试图让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同时也要纠正一两个错误。然而笔者完全懂得:一种观点在一个人看来是谬论,却可能被另一个人当作至理名言。

肯尼思·米诺格

1994年9月

目录

前言 I

- 1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1
- 2 古希腊人:怎样做一个公民 11
- 3 古罗马人:爱国主义的真义 20
- 4 基督教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28
- 5 建立现代国家 35
- 6 怎样分析现代社会 45
- 7 国家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均势 54
- 8 政治的实践(之一):怎样做一个参与者 64
- 9 政治的实践(之二):政党与政治信条 75
- 10 政治的实践(之三):正义、自由、民主 84
- 11 科学地研究政治 92
- 12 意识形态向政治挑战 100
- 13 政治会在21世纪消亡吗 109

索引 118

英文原文 125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据说古巴格达哈里发哈伦·拉施德^①常会乔装成乞丐以访察民情。聚集在绝对权力周围的谄媚者们包围着哈伦，他只有使用迂回战术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哈伦就是那个著名的伊斯兰国王，他宣布将山鲁佐德处死，可是山鲁佐德会讲好听的故事，讲了一夜又一夜，一共讲了一千夜。哈伦听得入迷，一再推迟执行死刑，最后竟娶她为王后。这个著名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专制体制的形象：那种政体的秩序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在专制政体中，有关秩序的最高准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然而专制体制也不是完全不讲正义的：正义在十分传统的社会里也普遍流行着——习俗主宰一切，人们把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当作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一个神授的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代的兴衰更替遵循着中国人常说的“天命”，但对农民来说，生活并没发生多大变化。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发生了冲突，以色

① 哈伦·拉施德(766—809)，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统治者，以残暴和骄奢淫逸闻名。

列人便到统治他们的先知撒母耳那里说，他们需要一个既能主持正义、又能带领他们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赞成这个要求，还警告他们说，这样的王将会剥夺他们的财产，束缚他们的活力。但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要像别的民族一样，立一个王。在当时的中东，“王”就是一个用专制的方式对待民众的统治者，与欧洲立宪制下的统治者很不一样。之后的情形是，以色列人很幸运地拥立了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些著名的君王，他们使以色列人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安定，甚至为以色列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所罗门对两妇人争夺同一婴儿案的裁决^①只是他传奇式智慧的一个最脍炙人口的例证。然而这些贤明的君王最终还是会采取暴虐的举措：最后所罗门规模浩大的工程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终于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专制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类型。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几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统治过，而西方的思想创造则总是遭到各种专制统治者的敌视——从残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乱的罗马君王如卡利古拉和尼禄，还有印度和中国那样的远方异邦的皇帝。在欧洲，追求专制权力的人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欧洲人有时会被某种以诱人的理想主义面目出现的专制体制所蒙蔽——希特勒就使用过这种手法。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专制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都不远。许多国家至今还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它随时都可能带来痛苦或死亡，人们就像生活在疯人院里。

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独裁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古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

^① 见《圣经·旧约·列王纪》。

民族优越感)恰恰在于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这一观念上的差异告诉我们,政治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于文化和环境的每一步变迁都会引起政治含义的变化。所以,我们想要理解政治,第一步就必须摆脱现有的未加思索的信念的束缚。为什么最初曾是某些西方国家的精英所从事的一种有限的活动,如今竟被看作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关注的焦点?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看一看古希腊人赋予政治的价值观。希腊人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完全不同于东方人。希腊人赞赏埃及、波斯这些东方帝国的绚丽文化,却又鄙视这些国度的统治方式。他们把这种外国制度称作“专制主义”,因为这种体制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无异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希腊人是武士,他们鄙夷东方臣民在君主面前匍匐下拜:他们无法忍受公民与当权者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两千多年后,我们完全继承了这种对匍匐下拜的习惯性反感,部分的原因是“匍匐下拜”是基督教中用来描述人与神之间的距离的一种意象。谈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常用domination(支配)这个拉丁语词。古希腊人说的*despotes*(主人)和古罗马人说的*dominus*(主人)指的都是奴隶主所特有的那种权力。当代有许多语言符号表明这种意识在我们的自我认知过程中占有未受削弱的中心地位,例如现代英语中的dictatorship(独裁)和20世纪出现的新词totalitarianism(极权)。

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那里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也

没有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公众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强音。奇怪的是,臣民的这种被宰制状态倒使一些专制体制成为精神启蒙的著名发源地。在一个国度里,强权的反复无常也会引发一种回应,富有思想的臣民转向神秘主义、禁欲的斯多葛主义或是其他消极隐退的信仰。他们在超越感官的精神世界里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而社会和政治生活则被贬低为一种幻象。这种趋势的后果往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停滞,只有短暂的繁荣算是例外。

多数社会都起源于军事征服,武力征服之后自然会产生专制制度,所以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就应当被看作是了不起的成就。^①欧洲人曾在三个著名的历史时期创建过这种秩序,但其中的两次都以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告终。第一次是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专制统治者就攫取了政权。第二次是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帝国,但帝国的成分实在太庞杂,只有专制政权能防止它解体。第一次的经历产生了斯多葛主义和其他的遁世哲学,第二次历史经历则为基督教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典型的中世纪政治产生于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的野蛮国家,从中世纪政治中又衍生出现代的政治制度。既然我们依旧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就只好在历史不断的前进中理解政治,我们不知道前

① 作者有意区分专制(despotism)和政治(politics)这两个概念。政治专指以古希腊传统为代表的治理方式,所以政治体制中不包括专制政体。因此,本章标题中说“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实际上,本书中的“政治”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即此章所说的与专制相对的政治;广义的政治指所有的政治,专制主义自然也包括在内。

进的终点究竟在何方。

然而我们的确知道,虽然反对专制曾是西方政治传统的主要基石,但如今人们对专制的抵制已经变得暧昧起来。近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曾梦想运用专制政权所独有的无法抵御的强力来清除我们社会中明显存在着的弊病。在欧洲,专制主义的政治方案,即便十分富有哲理或识见,也会遭到失败,除非是把它真实本质掩盖起来。既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出幻象频生的剧目,人们就很容易发明出新名称、新观念。20世纪以各种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专制体制构筑了一个广大的政治实验场,各式各样创建完美社会的政治设想都在这里进行了演练。这些试验都失败了,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许多人却没有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必定与隐藏在我们文明深处的某种倾向相关联。因此,要洞察政治就不能不研究某些征兆——它们或许能揭示我们文明中某一个断层的深处隐藏着什么。

一个众所周知的线索就是当前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生活以及个人良知的领域——个人良知即个人凭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和兴趣。这种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系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定,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能存在。正如伯里克利^①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头一年阵亡的雅典人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所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当然,无论是就法律还是公民的

① 伯里克利(前495—前429),古希腊政治家。

态度而言,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实际界限总是在变化。同性恋和宗教信仰过去曾受到公共领域的规制,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然而婚内强奸和残害幼年子女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政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我们这里说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界定为自由和民主政治。

在典型的专制国家,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专制君主的财产,但现代社会“公”与“私”的基本界限却被从另一个方向一步步侵蚀了:私人领域受到公共领域限制的部分在逐步扩大。如果任何引起争议的问题都被称作“政治”问题,如果像一个流行的口号说的那样:“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那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外了。这种口号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然而它却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基本准则,其后果显然是将个人限定在一个单一的控制体系之内,毁灭现代国家一直承继着的传统: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法律等不同的角色相互独立,各司其职。

“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之类的口号都是伪装成普世真理的行动计划。这类口号的意思常是模糊的,但口号中隐含的观点一遇气候便会活跃起来,要求实行与我们珍视的如个人自由之类价值观相抵触的政策。人们说,只有提高警觉才能保持自由,而警觉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留意政治语汇,这种语汇常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研究政治学首先就要注意变化的迹象。政治是一个幻觉舞台,粗心的观察者看不出它的底细。现实与幻象是政治研究的两个中心课题。首先碰到的就是政治制度和机构的命名问题。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主要是西方政治模式,也就是说,每个国家

都有一种政治体制,还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制度:议会、宪法、公民的各种权利、工会、法庭、报纸、部长等等——看起来全世界的政治都在按照同一种模式运行。事实却绝非如此。比如说,日本有一名被称作首相的政府官员,外国政治家就常闹误会,他们会很失望地发现,日本首相无法像其他国家的首脑那样不时颁布国家政策。1936年斯大林颁布了据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宪法,为苏联人民提供了权益和保障。事实上,就在颁布这部宪法的同时,斯大林正在用假审判的手段对苏联高层人士进行“清洗”。成百万的人被枪决。政客爱撒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最让世人迷惑的却是称谓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

首先,“政治”这个名词本身就含义暧昧。一个概念如果过分地延伸就会断裂而失去表意功能。“政治”本来只指君主、国会、部长们的活动,还包括那些帮助或阻碍这些人物取得权力的政治参与者的活动。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属于社会生活或是私人生活的范畴。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以某种方式贴上了“政治”的标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这里仅举一例:政府总是要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自己,反对党则总是要把一切坏事的账都算到政府头上,于是政府和反对党就在合力传播着一个观念,即一切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政策造成的。这种观念使得民众遇事就去向政府请愿,似乎一切利益都可以由政府来施予。这种做法又反过来加强了“一切事物事实上都是政治”的观念。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政治的功用和含义日渐扩大。在欧洲,从远古以来政治就一直是君主和大臣们从事的活动,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他们的业绩。参与政治就等于获得了不朽。1953年菲

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第一次夺取政权失败，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凡欲名垂青史的人都会去从政。本可能成为克伦威尔^①的人们不再满足于“不曾害国家流血”，他们再也不甘愿默默无闻地老死在宁静的乡村墓地。^②他们从政去了。法国革命将这种荣誉带给了本该默默无闻的人物如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夏洛特·科黛、圣鞠斯特等。革命者是往历史这面墙上信手涂抹的艺术家。这是极端的例子，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希望不朽的热情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在人人可投一票的普选中得到了满足。普选当然是一种通货膨胀，它使选票贬了值，但我们仍然认为选举是一项公民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艾丽丝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这是英国报纸的一条大标题，报道一位南非黑人老妇1994年第一次投票的情况。

我们现代人（尤其是那些自认为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特别容易对政治的本质产生误解：我们想出了种种巧妙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思想比我们的祖先高明得多。所有的文化群体都认为唯有自己信奉的信念最正确，然而今日受过教育的人们尤其无法摆脱当代各种偏见的束缚。比如说，进化的观点就使许多人认为，**我们的**信念都比前人的那些有明显缺陷的观点更伟大。当代流行的思潮的确否定了进化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我们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曾领军推翻英王查理一世的统治，成为共和国的首脑，称“护国公”。

② 此处借用著名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1716—1771)的抒情诗《墓园挽歌》。卞之琳对这句诗的翻译为“有一位克伦威尔，并不曾害国家流血”。